

南太平洋岛国华人社会的发展： 历史与现实的认知

费 晟¹

(1. 中山大学 广东 广州 510275)

摘要：南太平洋岛国的华人移民社会最初形成于19世纪中后期，主要是近代中国劳工输出的结果。“二战”后，华人移民基本实现了本土化；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又出现新的移民潮，形成较大规模的华人移民群体。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华人移民都积极参与并推动了南太平洋岛国各项事业的发展，由此确立起较高的经济与政治影响力。不过，华人移民群体也不可避免地被当地社会内部冲突与矛盾所波及，并受到部分西方媒体及少数政客的借题炒作。本文认为，从我国发展对南太平洋岛国战略关系的角度看，岛国华人社会将扮演日益重要且积极的纽带角色。

关键词：南太平洋岛国；华人社会；移民

中图分类号：K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049(2014)11-0055-08

DOI:10.14015/j.cnki.1004-8049.2014.11.007

一直以来，我国学术界与有关职能部门对南太平洋岛国^①的华人移民社会知之甚少。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首先，相比于东南亚与美洲社会，这里并非近代史上华人劳工输出的主要目的地，华人社会规模相对有限，历史影响不大；其次，从传统地缘政治上看，南太平洋岛国不属于我国发展对外关系的重点领域，与之有关的议题也就显得无足轻重；最后，这里并非改革开放后新移民的主要目的地，具体的服务

与管控任务不重，对国家软实力构建的战略意义似乎也不大。^②然而，以上认识存在相当的片面性：首先，南太诸岛与中国存在着民族学意义上的紧密联系，在近代它们也是最早接受华人移民的海外地区之一。目前，南太诸岛还在不断吸收各类新兴移民群体，所涉规模与影响均不可小觑。其次，随着中国全球利益的拓展与调整，大洋洲在我国国际战略推进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华人移民社会已成为中国拓展对南太

收稿日期：2014-09-13；修订日期：2014-09-19。

基金项目：本文为广东省高层次人才项目“全球视野下的岭南社会与文化”（11200-3210005[141400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费晟（1982—），男，浙江杭州人，中山大学讲师，中山大学大洋洲研究中心研究人员，聊城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大洋洲区域史、华人华侨问题。

① 本文所涉及的南太平洋岛国不仅包括独立的民族国家，也包含该地区非主权政治实体，为行文方便统一用“南太平洋岛国”加以概括，特此说明。

② 整个大洋洲地区包括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在内，学界有关的华人移民史与现状研究都乏善可陈。CNKI数据库中几乎没有相关主题的学术研究文献，而就作者与有关部委的专家在2014年上旬的两次座谈交流得知，官方对南太平洋岛国华人社会发展问题并无系统的了解。近年来，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是张秋生的《澳大利亚华人华侨史》。有关南太平洋岛国的研究，严肃的中文学术文献仅见于陈翰笙主编的《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八辑“大洋洲华工”，以及澳洲学者刘渭平在香港出版的《大洋洲华人史事丛稿》。

平洋岛国关系的重要纽带。南太平洋岛国华人移民社会的扩大及其活动亦造成一些复杂影响,需要全面客观的认识。本文试图梳理南太平洋岛国华人社会发展演变的过程与特点,概括分析华人社会对岛国各项事业发展的历史贡献与现实影响,引发方家对有关问题的关注。

一、岛国华人移民社会的形成

南太平洋岛国与中华文明的交集可以追溯到“南岛语族”的起源。所谓“南岛语族”,“是一个民族学概念,指现今居住于北起我国台湾、中经东南亚、南至西南太平洋三大群岛、东起复活节岛、西到马达加斯加等海岛上的,具有民族语言亲缘关系和文化内涵相似的土著民族文化体系。南岛语族主要包括马来人(一般包括台湾高山族)、密克罗尼西亚人、美拉尼西亚人、波利尼西亚人等几大族群,总人口达2亿多,是一个十分庞杂的民族文化体系”。^①有研究指出,这些南太平洋海岛的原始居民其实与更广阔范围内的“百越先民”同属一个土著文化体系。^②最近的考古学和人类学研究也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南太平洋岛国土著居民起源于中国东南部沿海地带,他们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开始大范围向台湾及东南亚扩散,至公元前1200年左右又从东南亚进入了南太平洋海岛。以福建为中心的中国东南沿海地带可能是他们离开大陆的最后一块根据地。^③可以说,南太平洋岛国文明的起源与古代中华文明向海外的传播密切相关。

从文献资料方面看,同样可以确信早在西方殖民者抵达南太平洋岛国之前,中国与相关地区已经产生了密切的商贸联系,尤其是在更靠近东南亚的美拉尼西亚地区。这种交流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为中国朝贡贸易体系延伸的产物,比如1605年西班牙航海家就曾经记录巴布亚新几内亚岛附近一些岛屿使用中国制造的产品,那里至少应是“久与中国人通商贸易之地区”^④。不过,华人移民成批涌入南太平洋地区并对当地产生影响则肇始于1850年前后。这里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被拖进了欧美列强所构建的全球资本主

义殖民体系,我国的劳动力资源开始根据全球市场需要被调配,太平洋贸易网成为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国家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的网络。^⑤

具体来看,华工前往南太平洋诸岛与其前往澳洲是一脉相承的。从籍贯上看,从1848年起,约有390名契约工从厦门被输送到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殖民地。^⑥不过在1851年澳大利亚爆发淘金热之后,以珠三角地区为中心的广东人开始成为南太平洋岛国华人移民的绝对主力。从移民渠道看,前往南太平洋岛国的华工基本是殖民地用工公司直接征募的。这种形式到19世纪60年代才流行起来,第一个原因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签订的新约使中国劳工出洋正式合法化,洋商对从内地直接征募劳工不再有顾忌;第二个原因在于,南太平洋岛国迟至19世纪中后期才相继被列强正式瓜分和开发,用工需求到此时才激增;第三个原因是,这些岛屿地区的自然环境与生活条件更为严苛,如果不通过有计划乃至强征雇工就很难获取劳动力。近至巴布亚新几内亚,远到法属波利尼西亚,都以地理上的隔绝著称。这基本符合西方列强在南太平洋岛国殖民侵略的演进步骤,但从侧面也可以判断华工对南太平洋诸岛开发的不可替代性。

以下是有关华人劳工在南太平洋主要岛屿散居的详情:^⑦

法属波利尼西亚:1861年经由香港开始向

① 吴春明“‘南岛语族’起源研究述评”,《广西民族研究》,2004年第2期,第82页。

② 吴春明、曹峻“南岛语族起源研究中的‘四个误区’”,《厦门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第91页。

③ 苏文菁“从南岛语族看台湾与福建的关系”,《福建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第7页。

④ [澳]刘渭平“巴布亚新几内亚华侨简史”,《大洋洲华人史事丛稿》,天地图书出版社(香港)2000年版,第84页。

⑤ 何芳川“太平洋贸易网与中国”,《世界历史》,1992年第6期,第70页。

⑥ “Governor Sir C. A. Fitz Roy to Earl Grey 3 Oct. 1849”, No. 1, *Accounts and Papers*, Session 4, Feb. 8, August 1851, Vol. XL. 在1853年之后,随着澳大利亚淘金热兴起,珠三角地区大量华人以自主移民的形式进入澳大利亚,从此形成了广东人口的绝对优势。

⑦ 数据综合自《华人出国史料汇编》、《大洋洲华人史事论丛》等中文资料,以及David Wu, *The Chinese in Papua New Guinea (1880—1890)*,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2; Nancy Tom, *The Chinese in West Samoa (1875—1885)*, Commercial Print Company, 1986等英文材料。

此地输送契约劳工。在官方有确切记录的年份中,规模维持在320—350人/年左右。截至1931年,法属波利尼西亚的华人有4056人,约占当地全部人口的1/10。法属新喀里多尼亚:1860年开始经广州和澳门输入中国劳工,至1870年总计约500人左右。1923年后逐渐递增,至1931年亚裔人口达到12000人,其中华人规模不详,但仅次于越南人和爪哇人。斐济:19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经由厦门和汕头招募华工,至1913年已经招募4000余人;至1934年华人规模为1436人,部分华人已在当地从事商业。巴布亚新几内亚:英、荷、德属殖民地都曾输入华工。英属部分在19世纪70年代开始从澳洲调入华工;荷属部分一直有华人商贩,20世纪20年代后开始输入华人劳工,至1935年人数达到3000左右;德属部分从1885年起经由汕头和香港开始输入华工,一度维持在2000人以上,1900—1914年累计又有3500人被招募。“一战”后,德属部分殖民地归澳大利亚统治,继续征召华工,20世纪20年代有华工2000人左右,商贩散工近1000人。至1935年,注册的华人有1448人。瑙鲁:1906年经由汕头开始招募华工,然后于1907、1911、1913年3次统一征召华工,累计有3700多人。由于后续劳动力补充不足,至1921年仅剩597名华人。1922年开始从香港招募华工,三年内招收近700人。后续又间断着由澳大利亚出面征召华工,到1935年华工数量为921人。西萨摩亚:1900年被美德瓜分后,美国禁止中国劳工入境,德国则引进华工开发种植园,经汕头和香港招工。1903—1914年引入近4000名华工,至1925年岛上华工规模为2312人。据统计,至1936年萨摩亚全境内华工为503人。

根据上述情况,可以对华人移民向南太平洋岛国输出的历史概貌与意义做出一些判断:第一,有明确数据证明劳务输出是南太平洋岛国吸收华人移民的主要形式。中国与南太平洋岛国产生直接联系至少已经有150年,华人对许多地区的开发作出了支柱性的历史贡献。第二,华人移民南太平洋岛国的数量应达到数万人,如此规模使得华人足以维持相对稳定统一

的海外华人社会。第三,与澳大利亚主要吸引珠三角地区的移民略有不同,南太平洋岛国始终混杂着来自珠三角、潮汕地区与闽南部分地区的移民。当然也可能存在从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移向海岛地区的二次移民。第四,华人移民不仅仅从事农矿开发工作,也有相当数量的人成为小生意人或进入其他第三产业,这使得岛屿地区的早期华人移民社会从一开始就渗入当地社会生活。第五,也是最与众不同的一点是,与北美或东南亚相比,尽管南太平洋岛国吸引的华人移民数量并不惊人,但考虑到这些地区原住民的人口规模同样不大,华人群体完全可能决定性地影响当地社会的生活。以瑙鲁为例,统计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散居在该岛的人口时发现,华人数量与土著居民数量不相上下,都在1500人左右。^①

二、太平洋战争以来岛国 华人社会的嬗变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海上交通受阻,华人移民在岛屿地区不断聚集甚至可能超越本土居民的势头被遏制。当时密克罗尼西亚与美拉尼西亚部分岛屿或被日本侵占或沦为战场,许多华工被迫转移到澳洲或安全的岛屿,如瑙鲁的华工就被撤离到吉尔伯特群岛。“二战”结束后,契约华工制度在岛屿地区被彻底废止,许多欧美列强托管的岛屿对华人移民也宣布了禁令,如此一来,华人也就停止了大规模、有组织地向南太平洋岛国移民。

局势的变化一方面促使华人移民在南太平洋岛国更加离散,华人社区的分布更加广泛;另一方面也刺激了岛屿地区华人移民的本土化,第一代移民只要没有回国,均入籍归化或者与土著联姻。南太平洋岛国中面积最大、人口最多、华人社会规模最大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就是

^① 有关华人进入瑙鲁开发的具体情况可参见: Carl McDaniel and John Gowdy, *Paradise for Sale: A Parable of Natur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当时巴新华人社会面临的主要压力在于:首先,多数华人生活的岛屿殖民地实际沦为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托管地。以巴布亚新几内亚为代表的各托管当局都坚决推行澳大利亚国内的“白澳政策”,即禁止中国人继续移民,结果导致既存的华人社会加速凋零,或为了生存而与原住民通婚。其次,1949年后新中国建立,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绝大多数岛国华人群体被迫中断了与大陆的联系,但他们又不具有“回归”台湾的条件,结果是他们融入当地社会的要求进一步强化。到20世纪50年代末,澳大利亚开始允许在托管地出生的华人入籍。1966年巴新当局统计数据表明,总共有2455名居民自认是华人,其中生于中国的华人是566人,但只有282人还保留中国国籍。^①到70年代,当时的华人社会基本上与海峡两岸的政权都不再有密切联系,其中国认同也进一步淡化。1971年,巴布亚新几内亚有5万外籍人士,其中华人有3500人,但几乎没有一个还保有中国国籍或出生于中国。到2000年时,这种情况已经发展到人口普查中不再关注是否有中国人,因为几乎全部华裔人口都已经是巴新籍或澳籍。^②

1960—1980年,大洋洲多数岛屿地区摆脱托管身份实现独立或自治,这在很大程度导致其移民政策的再次调整。一方面,独立后南太平洋岛国自力更生的任务艰巨,各国均把发展对外商贸和吸引外资视为现代化建设的手段,这就给亚洲移民的进入创造了契机。另一方面,1970年澳大利亚废止了“白澳政策”,并且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前所未有地开放接收亚洲移民。这也使深受其影响的南太平洋岛国进一步放松了对亚洲移民的抵触和管制。这都促成了华人新移民群体在南太平洋岛国的崛起。

大体来说,新兴华人移民群体有四类。第一类移民是1980年以来东南亚华人企业在岛国开展资源开发活动,特别是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森林砍伐活动所使用的东南亚及华人劳工。这些企业建设起一整套的伐木业流水线,并且从一开始就与地方官员有灰色关系,借此谋求

利益最大化。比如来自马来西亚及印尼的华人务工者大概达到6000人左右。^③

第二类移民是2000年以来越来越常见的中国劳工,即中国企业承建当地工程以及开发当地自然资源带来的大量务工人员。早在2007年萨摩亚首都阿皮亚的一系列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作为承建单位的天津建筑就引入了大批中国员工。近几年,由中冶集团不断推进的巴新“瑞木镍钴矿”(Ramu Nickel)项目更引人注目。它是迄今中国企业在海外最大的有色矿业投资项目,总投资高达13.7亿美元。在2009年的建设高潮阶段,4000名雇工中有60%以上来自中国。而到2012年实际投产阶段,1000多名工人中仍有2/3以上是中国人。^④鉴于太平洋岛国人口稀少,而前往当地进行投资与建设项目的国内企业日益增加,这种在数年内常驻的中国员工构成了可观的移民群体。

第三类移民是通过合法移民程序获得岛国国籍的华人,主要是投资移民。尽管我国不承认双重国籍,但由于接收国承认双重国籍,结果形成了在岛国有定居生活,但其实与国内保持更紧密联系的华人移民群体。比如斐济就是一个典型,由于大量劳动力特别是技术人员移民至澳大利亚及新西兰,该国只能进一步放松吸引外来移民的限制,甚至鼓励吸收海外移民前来创业。^⑤该国税收及社会管理法规相对宽松,于是有相当一些中国人出于转移资金、规避风险或个人发展需求移民斐济等国。

第四类移民最为复杂也难以统计确切人数,那就是以个人身份进入岛国的中国人,其中包括大量“未经许可”进入的移民。应该说,以个体经商者身份出境谋生是近年来中国人海外

^① Hank Nelson, *The Chinese in Papua New Guinea*, Discussion Paper of Research School of Asia and Pacific, April 2007, p. 2.

^② Ibid^① p. 4.

^③ Ibid^① p. 6.

^④ Graeme Smith, “Nupela Masta? Local and Expatriate Labour in a Chinese – Run Nickel Mine in Papua New Guinea”, *Asian Studies Review*, Vol. 37, No. 2, June 2013, pp. 184 – 185.

^⑤ Stewart Firth, *Globalisation and Governance in the Pacific Islands*, E – Press of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2006, Chapter 6, http://press.anu.edu.au/ssgmglobal_govhtmlch06s08.html#top.

移民的重要形式,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南太平洋岛国也不例外。这些个体户多来自福建与广东,主要是在当地社区从事零售业或经营饭店,也开始从事移民和旅游中介活动。

截至 2007 年,南太平洋岛国拥有常驻华人移民 8 万人左右,具体来看统计较为明确地包括: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斐济各 2 万人左右,北马里亚纳联邦为 1.5 万人左右,法属波利尼西亚 1.4 万人左右、关岛 4 000 人左右。^①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一些重要而显著的问题:首先,在讨论南太平洋岛国新兴华人移民群体时,不能套用一般所说的移民概念。由于岛国本身相对较少具有吸引中国普通民众长期定居的要素,大量新移民其实都具有“过客”性质,其生活仍然与中国国内社会和市场紧密绑定。其次,新兴华人移民从事的活动非常多元化,其组织性与纪律性在各个行业并不平衡,个体移民尤其不易于统计和管控。相对而言,新移民对当地文化和法规的了解和重视有待进一步提高,对当前岛国华人移民群体的认识一定程度上需要注意世代区别的问题。^②

三、岛国华人社会的历史与现实影响

华人对南太平洋岛屿的开发做出过历史性贡献,其涉足领域囊括当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影响较大的包括瑙鲁与巴纳巴岛的磷酸盐矿开采、所罗门群岛等地的檀香木砍伐、斐济与萨摩亚等地的蔬果种植园,等等。在这些产业相对衰落之后,华人移民大范围转投商贸领域,在积累起财富的同时也极大便利了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比如斐济乡村最早的零售商店就是由华人创办的。华人的生产生活也给当地社会打下深深的文化烙印,包括重塑岛国的饮食传统:沿承自中国的米饭、面条、叉烧包、杂碎汤等食物已成为本土特色饮食。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华人移民不仅在岛国的经济领域中扮演重要角色,而且很早就开始在政治领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在 20 世纪早期,岛国移民们曾积极支持中国国内推翻帝制

缔造共和的运动,巴布亚新几内亚、斐济、法属波利尼西亚及萨摩亚等地移民都曾资助国民革命,并建立过政党组织。与此同时,早期移民也努力自我管理和保护,如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陈兼达(Bernard Chan)曾出任巴新华人救济会主席,在日军侵略占领巴布亚新几内亚期间,与敌方巧妙周旋尽力保护华人利益,战后又积极参加赔偿委员会工作,帮助华人在最短时间内挽回损失,奠定了日后华人经济复兴的基础。^③

在南太平洋岛国民族国家建设时代,华人参政议政的表现更加突出,比如祖籍广州台山的巴布亚新几内亚政治家陈仲民(Julius Chan)爵士就是一个典型。他出生于 1939 年,父亲是种植园引进的华人契约工人,母亲是土著居民。陈仲民在 1960 年就涉足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坛,1972 年当选国会议员,积极推动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运动,然后又在 1977、1982、1987 及 1992 年连续当选国会议员。由于能力出众,他四次当选副总理,两次出任财政部长以及一系列重要内阁部长。1980 年他成为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后选举产生的第二任总理,1981 年陈仲民获得大英帝国最优秀爵级司令勋章(KBE)并于次年成为英国枢密院顾问。1994 年他再次当选总理,离任后又于 2007 年起担任新爱尔兰省省督。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由于华人移民后裔拥有相对强大的专业技能,这使得新一代华裔政治家具有格外突出的政治话语权,比如斐济著名律师梁林(Graeme Leung)曾出任斐济法学会会长兼全国选举委员会主席。他受命主导了对 2000 年斐济军事政变参与者的司法审判,随后还坚决抵制对政变分子的缓刑动议,赢得了广泛的支持。萨摩亚华人也有类似的表现,

^① Paul D'arcy, "China in the Pacific: Some Policy Considerations for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Discussion Paper, State Society and Governance in Melanesia, July 2007, p. 2. 2007 年之后全面可靠的人口统计有待于进一步确认。

^② James Chin, "Contemporary Chinese Community in Papua - New Guinea: Old Money Versus New Migrants", *Chinese Southern Diaspora Studies*, Vol. 2, 2008, pp. 117 - 126.

^③ 陈志明编《澳洲党务发展实况》,中国国民党澳洲总支部(悉尼),1935 年版,序言;张宇权著《大洋洲名人录》,中山大学出版社,第 32 页。

如前审计长苏瓦·阿冲(Su'a Rimoni Ah Chong)是著名的经济师。在1990年,他依托议会的支持,与当时萨摩亚政府的腐败行为做了坚决而持久的抗争,最终使得萨摩亚建立起更透明的官员收入监督体系。由于积极推动落实民主监督机制,阿冲在2003年荣膺“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颁授的年度大奖。此外华裔政治家尼克·李航(Nikko Lee Hang)自2006年至今出任萨摩亚内阁财政部长一职,而汉斯·吉尔(Hans Keil)则担任工商及旅游部部长。2007年汉斯因护照问题在美陷入法律纠纷,立刻有1万多名萨摩亚居民联名向美国使馆请愿表示支持汉斯,威望之高,可见一斑。^①毋庸置疑,南太平洋岛国华人积极从政并且取得较高社会地位的情况是其他地区华裔族群难以比拟的,他们所占人口绝对数量不多,但社会影响力出众。

不过,随着移民群体的不断膨胀以及中国对南太平洋岛国投资与援助的急速上升,岛国新兴华人移民也开始面临老一辈华人未曾遭遇的挑战。2005年以来,因为长期积累的内部发展不平衡问题(以巴布亚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为代表)以及政治运作不公的问题(以汤加、斐济、基里巴斯为代表),南太平洋岛国普遍出现了政治与社会动乱的情况。在一系列的骚乱中,有大量仇富和反社会的打砸抢暴力行为,华人移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也遭受重大威胁和损失。

对此,西方媒体进行了过度阐释。因为在许多欧美媒体的报道与分析中,当地族群的反华情绪似乎是这些社会骚乱的重要原因之一。尤其是2006年所罗门群岛的骚乱格外触目惊心,首都霍尼亚拉近90%的华人商铺和居所被毁,波及近2000名当地华人。^②但是西方媒体的这类判断过分强调了中国的扩张及华人新移民对当地社会造成的冲击,却忽略了岛国社会自身发展的深层次矛盾。那就是南太平洋岛国的民族国家建设是在去殖民化过程中突然启动的:一方面,托管势力在形式上退出后留下了当地高层治权的真空,而在传统的部落文化反弹过程中,现代民主政治步履蹒跚,法制落后;另一方面,实现政治独立的岛国不再得到托管国的全面

援助与扶植,其经济发展乏力、管理低效。这些困境使得本就交织混杂的族际矛盾与阶级矛盾不断激化,这最终又导致了连绵不绝的社会动荡,反华情绪更多是一种矛盾转移的结果。

一个常被引述的矛盾焦点是低端零售产业的激烈竞争,华人业主被认为排挤了当地同行。这一点最早在2000年汤加政府强行关闭华人商铺时引起了世人关注,次年汤加政府又拒绝延长600名华人的工作签证。^③仔细追究,这种困境其实是殖民统治的副产品。正是由于前宗主国或托管国的大型企业主要是利用大型项目掌控天然资源开发,较少注意发展岛国的第三产业,结果当地劳动力消化不足。同时,由于托管统治时代原住民社会积累的资本与技术非常有限,原住民大多又只能从事一般服务业,由此华人与土著产生了竞争。不过,由于第三产业整体疲软,汤加、萨摩亚等岛国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一直推行“外汇换护照计划”(即吸引投资移民),截止到1998年废止时,大致有近千名华人利用这个契机移民,而抵达之后的华人几乎都是从事商业。以汤加为例,该国72%的个体生意都控制在中国移民手中,而在汤加总共11万人口中,华人只有4000人。因为“中国移民总是专注于零售业,因为他们是做小本生意,比较好运作,还能轻松利用中国国内的资源并且很容易得到自己家人、亲戚和朋友的建议与支持”。^④显然,新兴华人移民虽然可能与当地同行产生竞争,但在更大范围内是受到当地政

① “10 000 Sign Samoan Petition to Free Keil in US”, Nov. 11, 2008, <http://www.radionz.co.nz/international/pacific-news/180293/10-000-sign-samoan-petition-to-free-keil-in-us>.

② The Free Library, “Chinese Targeted in Pacific Islands Unrest”, May 20, 2009, <http://www.thefreelibrary.com/Chinese+targeted+in+Pacific+islands+unrest-a0161187537>; “Chinese Presence in the Pacific Islands”, Global Envision, April 3, 2007, <http://www.globaleurovision.org/library/8/1540>.

③ John Braddock, “Tonga Announces the Expulsion of Hundreds of Chinese Immigrants”, World Socialist Web Site, December 18, 2001, <http://www.tongatapu.net.to/tonganewsbriefs/20000819.htm>.

④ Michael Field, “Anti-Chinese Racial Trouble Threatening South Pacific”, July 1, 2008, <http://www.michaelfield.org/chinapacific2.htm>.

府邀请和激励的,事后也确实收到了活跃地方经济的效果。片面指责华人产业垄断而不考虑历史背景有欠公允。

此外,在骚乱中是否普遍存在对华人的仇恨与袭击也值得商榷。比如 2009 年所罗门骚乱具有极大的偶发性,当时新任总理被认为接受了来自台湾方面的政治献金,其反对者才在游行过程中不加区分地袭击华人商铺。又如在汤加 2006 年的骚乱中,首都 80% 的 CBD 区域在暴乱中被捣毁,而其中只有 25% 左右的中国商铺遭受损失,相对是很少的。在许多暴乱分子试图烧毁商铺时,普通市民出面阻拦甚至保护商铺,包括中国人的商铺,担心纵火会危及自身的居民区。^① 汤加的社会动荡主要是因为民主化运动对国王专权的不满,这里最公开的反华主张也是围绕限制国王权力展开的,因为“人们担心国王擅权,他一夜之间直接凭个人意志就批准 400 个中国人移民汤加,进一步加剧行业竞争”^②。可以说,岛国社会的反华情绪主要是当地阶级矛盾导致的。对新兴华人移民群体与当地民众的龃龉,最好从法律冲突维度加以理解,而不是过分从民族冲突维度加以分析。萨摩亚最大的报纸《萨瓦利》(Savali)甚至刊文指出“指责中国移民,说他们勤奋工作、经济上能干,这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们对南太平洋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与其说要抵制华人,不如说如何学习他们怎么做生意。”^③

不可否认,相比于岛国华人移民群体不便控制的外部因素,新移民群体的自律问题是一个更直接影响其命运的因素。比如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除了因大规模倾销中国廉价商品导致当地同行业者破产之类的指控外,一些华商还被指兜售许多根据当地法律不可随意出售的烈性酒类饮料。更有甚者,在萨摩亚等地警方多次查获华人社会存在有组织化的贩毒售毒以及拐卖妇女人口的活动。^④ 事实上,自律问题并不仅仅事关个体移民,中国企业的大型投资与建设及其带来的“过客”型劳工可能造成更多负面影响,即使这并非有意为之。中国企业投资时提出的一些过分强调自身利益的要求,格外恶化了岛国舆论对华人移民的厌斥。事实上,中国企业并

非没有做促进当地人就业以及改善当地基础设施的努力,但这与当地社会期望值仍然存在差距。显然,与在第三世界活动的许多国家的遭遇相仿,中国投资者及员工在南太平洋岛国的活动必须充分考虑到当地环境保护、传统习俗以及国际惯例的制约,否则不仅会增加额外成本,更会恶化当地民众对中国国家形象特别是华人移民群体形象的认知。当然,我们同样要强调从法律角度而不是族际冲突角度来理解这些矛盾和挑战。南太平洋岛国华人社会对一些政客炒作中国投资威胁并以此挑动反华对立的言行进行了反击。面对恶意煽动当地民众反华情绪的言行,华裔旅游部长汉斯·基尔(Hans Kell)当即予以了回击,强调萨摩亚 18 万人口中有 3 万多拥有华裔血统,炒作对华人的敌视不仅对国民经济发展不利,而且破坏社会团结。^⑤

显然,在中国全面拓展国际关系并积极开展对南太平洋岛国投资与商贸活动之际,拥有较高社会地位且十分活跃的当地华人社会将是一笔宝贵的财富。而在面对新兴华人移民活动引起的一些复杂影响时,需要将这些活动放置到法律维度而不是族际冲突维度下加以冷静分析和看待,要对西方媒体及岛国部分政客的炒作有所申辩。应该强调,在南太平洋岛国寻求稳定发展的道路上,华人移民更多起到了一种有利于争取中国资源的积极作用。一些岛国清楚认识到了这一点,如 2014 年 5 月萨摩亚议长率团访问福建省,希望建立友城关系并谋求技术援助与经济投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萨摩亚有相当规模的福建籍华侨,福建也与萨摩亚一直保持着密切交流。

① “Or a Race Riot?”, July 28, 2008, <https://libcom.org/history/tongan-riots-2006>.

② Ibid①.

③ Michael Field, “Anti-Chinese Racial Trouble Threatening South Pacific”, July 1, 2008, <http://www.michaelfield.org/chinapacific2.htm>.

④ Ibid③.

⑤ Claire Farrell, “Samoa: Will the Island Be ‘Exploited’ by Chinese Firms?”, June 13, 2013, <http://www.theforeignreport.com-06/13/samoa-will-the-island-be-exploited-by-chinese-firms/>.

四、结 语

华人社会在南太平洋岛国的离散可以比较明显的区分为两个阶段,一个与晚清时期中国劳工的海外输出有关,另一个与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近年来经济活动迅速国际化有关。新老华人移民群体都全面卷入了当地的生产与生活,产生了可观的社会效益及影响。鉴于南太平洋岛国地狭人稀,华人移民凭借聪明才智与吃苦耐劳的精神更易在当地社会脱颖而出,事实也证明,他们享有其他华人移民社会并不常见的社会地位,尤其是政治影响力。从长远来看,这将是中国在南太平洋拓展影响力的重要契机。同样不应忽视的是,就近几年的情况看,新兴华人移民群体与当地社会也发生了一些龃龉,受到了当地部分政客及西方媒体的炒作。无论如何我们不宜过分夸大其中族际冲突色彩,而应该强调其中的法制建设问题。在发展对南太平洋岛国关系时,中国一方面应有极大的自

信与必要强调华人移民社会的历史与现实贡献,另一方面,也应该强调南太平洋岛国华人社会的存在将更有利于岛国获得中国的支持与援助。

南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可能在相当长时间内持续。其海洋资源丰富但长期缺乏开发资本与技术,因此华人移民在这些领域有进一步耕耘的空间。尤其是面对中国日益膨胀的国际旅游市场,南太平洋岛国潜在的开发潜力不可小觑。对此,需要调动当地华人移民的积极性,同时要强化国内相关机构的协调管理与疏导机制。由于南太平洋岛国华人移民主体来自于广东与福建,因此两地的侨务部门格外需要完善相关制度的建设,尤其是对突发情况有所预案。伴随中国企业加大向南太平洋岛国投资开发的热潮,将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员工批量进入南太平洋岛国,如何协调这些暂住移民与当地社会的关系,或将成为一个重要而紧迫的新任务。

编辑 罗凤灵 龚 婷

The Chinese Immigrants in the South Pacific Island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Present Situation

FEI Sheng¹

(1.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 As a result of massive international exportation of Chinese Labors in modern history, the Chinese immigrant societies had established in the South Pacific Islands since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earliest Chinese immigrants were largely naturalized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while larger groups of Chinese immigrants came since mid-1980s. The Chinese immigrants actively take part in building local societies and promote modernization of the South Pacific countries both historically and contemporarily. Consequently they also set up advantages in som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affairs to many other citizens. However the Chinese immigrants, whose contributions were sometimes unfairly charged by certain Western media and local politicians, were also involved in and impeded by local conflicts. Giving the grant China's strategy to promote cooperation with neighbor countries, the Chinese immigrant societies in the South Pacific Islands will be a positive and supportive force to bridge domestic society and local people.

Key words: Pacific Island countries; Chinese society; immigrant